

日本与中国 近代教育

董守义 袁闾琨 编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DONGSHOUYI YUANLUKUN

BIANYI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

编译者序言

中日两国的文化教育交流源远流长，但古今流向不同。在古代，交流的主潮表现为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在近代，这种交流则多表现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这种文化交流的态势是史学界所熟知的。不过，近代的交流呈现着一种光怪陆离的景象：一方面是中国莘莘学子诚心诚意地向日本学习近代知识，日本先生十分“热心”地向中国传授文化，并输入近代教育；一方面中日两国间的文化的、教育的，乃至军事的摩擦、冲突与战争又频繁发生，亲密的师生关系时时可能化作仇讎；教者与学者间常常摩擦，摩擦之中又继续教与学。这成了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的历史特点之一。

对于这个历史特点作宏观论述的中国方面的著作已经屡见不鲜。但是具体情形如何，人们却若明若暗。例如，在清末的中国教育近代化转进程中，有哪些日本教育家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日本政府出于怎样的考虑开展对华教育事业？民国初年，日本极力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扩充教育事业，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什么？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里，施行的方针有哪些差异，导致办学的成绩出现怎样的不同？中国历届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当局）对于日本在华教育事业有哪些具体对策？另如，日本在华教育事业与欧美在华教育事业的关系如何？等等，都是中国读者知之不多而急应了解的。

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亚洲教育研究室著名学者阿部洋主编的《日中教育文化交流与摩擦——战前日本的在华教育事业》一书，是一本以资料的丰富细密见长的新书，对上述诸多问题都做了正面阐述。该书原文共411页，有图表共36幅，采用典型分析与统计归纳并重的研究方法详尽地描述了历史的原貌，深刻地触及了矛盾的实质，比较客观地总结出交流双方的成与败，是与非。通过这本书，中国读者还可以看出日本学者观察和分析教育文化交流的角度、立场和方法，有助于增强彼此了解。书中所用大量资料，不仅日本方面的，包括不少中国方面的资料都是今天难以找寻的，对于研究工作者尤其宝贵。基于这些原因，我们编译了这本书。

原著是日本诸学者的专题论文合集，如果按原例题译出，会使多数读者产生枯燥感觉。所以，我们把各篇界限打开，按照专史体例重新编纂，以给人以清晰的历史时序感；同时删去支蔓和不相关的专题，以增强作为史书的系统性；最后定名为《日本与中国近代教育》，以更集中地反映编译后的全书内涵。在行文方面，为了简洁流畅的需要，我们没有采用硬译的方法，而是意译与直译相结合，追求符合原著的根本精神。至于注文，则进行了精减，但考虑到某些研究者寻觅资料的需要，我们采用了硬译法。

译文的分工是，第二、三章由袁闾琨同志承担；第一、四、五章由董守义同志承担，译后进行了互校。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谬之处，仍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教正。

编译者 董守义 袁闾琨

一九九〇年九月

原 著 序 言

本书所要考察的是战前日本在中国实施教育事业的情形、中国方面作出的反应以及由此产生出的相克和摩擦问题。在昭和55——57三个年度里，由文部省科学研究费(综合A)所支持的课题为《关于战前日本在中国教育事业的历史检讨——就其活动诸种表现与中国的反应——》的研究成果是本书的基础。

出于以下考虑，我们组织了这项合作研究，即近年与中国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正在急速地密切化，为了不再重蹈失败，而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有必要全面地检讨在“二次大战”以前曾经一度产生的两国间教育文化交流的失败、挫折，以便汲取教训。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表面的自我批判，而是要深入到交流的具体事件中去，弄清交流的来龙去脉，把握两国间教育文化界的分歧与距离，找出失败的根本原因。

根据上述课题意识，我们从如下各个侧面构建了本研究：

- 1、清末雇佣的日本教习和顾问对近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

弄清在20世纪之初向中国介绍、引进近代学校教育的顾问和教习等日本人的具体活动，并将他们与此期在韩国的日本顾问、教习们进行对比。

- 2、关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教育。

①东亚同文会对中国人的教育事业。

东亚同文会是战前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典型团体。本书要分析它在中国各地以经营学校为中心开展教育活动的具体状况及其过程，研究它与中国教育界间的协作和对立关系。

②满铁和关东厅在东三省对中国人开展的教育。

说明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设立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学校的经营状况，及其与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表现之一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关联。

③台湾总督府在华南经营的学校。

考察20世纪初叶以来台湾总督府在福建、广东两省经营的“东瀛学校”等籍民学校的状况以及中国教育界的反应。

3、中国对外人在华教育事业的反应——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理论及实际运动。

要阐明以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为背景而展开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理论及其发生发展的具体情况，它与欧美各国在华教育事业的、尤其与教会学校的关联等。要比较日本与欧美在华教育事业的对应模式。

笔者与同学诸君对近代日中两国教育文化交流的全面情况和特质的分析始自昭和50年。从那以来，我们有幸接受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相继组织了“东亚教育交流——关于中国人、朝鲜人留学日本的效果”（昭和50——52年）及“中国近代伴随外国冲击而来的文化摩擦”（昭和52——54年）等项共同研究。作为研究成果，昭和53年3月公开发表《亚洲教育交流——亚洲人留学日本的历史与现状》（国立教育研究所第94集），昭和57年1月公开发表《日中关系和文化摩擦》（岩南堂版）。

我们这次的共同研究可以说是上述研究的继续和发展。目

前，“美中间教育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的共同研究也在锐意进行之中，以便在与美国相比较的情况下，把握日中教育文化交流的特质。

当然，本书所研究的战前日本在华教育事业的各个方面，除有少数研究积蓄外，尚有资料（尤其是中国资料）不足的问题，因此，本书未臻详尽，苟得读者诸贤之指正，今后定当深入研究。

本研究对于迄今人们几乎尚未涉猎的战前日本在华教育事业作了整体阐述，如能给人们对这个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带来一些刺激和兴趣，我等则不胜欣喜。

我们的研究成果能集成这样一部书，乃因不断地得到以国立教育研究所所长木田宏先生为首的所内外前辈、友人们的厚爱、鞭策和协助，令人由衷地感谢。本书公诸于世，还得到近代日中文化交流研究的老前辈实藤惠秀先生的赐跋。

最后，对于使本书能够公开发行的第一书房社长村口一雄的盛情，表示诚挚的敬意。

昭和58年10月

阿部 洋

于国立教育研究所亚细亚教育研究室

目 录

编译者序言

原著序言

第一章 明治日本与清末中国的教育近代化…………… (1)

(一) 戊戌维新前后：日本谋夺中国教育权…………… (1)

1、维新前后：日本谋夺教育权…………… (1)

2、东文学堂：日本转移关注点…………… (9)

(二) 新世纪的开端：日本教习时代…………… (15)

1、日本顾问与教习的萍踪…………… (16)

2、直隶省教育改革与渡边顾问…………… (19)

3、师范教育的发端与日本教习…………… (22)

(1)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与服部宇之吉…………… (23)

(2) 华中师范教育的创议…………… (25)

(3) 典型：从三江师范到两江优级师范…………… (29)

A、三江师范学堂的筹备与菊池谦二郎…………… (29)

总教习菊池谦二郎的作用…………… (29)

中国教员的再教育…………… (29)

B、三江师范学堂的开办状况…………… (30)

师范教育之始…………… (30)

日本教习间的龃龉…………… (34)

中国当局批评日本教习·····	(35)
C、改组为优级师范学堂 ·····	(38)
改组与升级·····	(38)
巩固与发展·····	(39)
4、京师法政学堂与松本龟次郎 ·····	(42)
(1) 京师法政学堂与日本教习·····	(42)
(2) 松本龟次郎的日语教育·····	(50)
(3) 北京时代对松本的意义·····	(54)
5、中国妇幼教育与日本教习 ·····	(55)
(1) 幼儿教育·····	(56)
(2) 女子教育·····	(57)
 第二章 日本与中国东三省教育 ·····	(61)
(一) 日本在旧满洲的教育事业·····	(61)
1、殖民教育与文化摩擦·····	(61)
2、留日学生与日本教习·····	(64)
3、满洲的教育意识·····	(70)
4、关东州的同化主义教育·····	(78)
(二) 满铁的教育事业·····	(80)
1、“满铁”教育与关东州的联系与差异·····	(80)
2、从军政署到公学堂·····	(83)
3、盖平公学堂的设立及其他·····	(84)
(三) 同化主义教育体系的扩充·····	(86)
(四) 日本在东三省的高等教育·····	(89)
1、旅顺工科学堂与南满医学堂·····	(90)
2、中国方面的反应·····	(93)

(五) 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	(100)
1、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起·····	(100)
2、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组织·····	(105)
3、奉天教育厅长与日本总领事谋求解决·····	(108)
4、关东厅与满铁态度强硬·····	(110)
5、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深入·····	(115)
6、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结局·····	(118)
第三章 东亚同文会与华中教育·····	(121)
(一) 学校教育的创始与开展·····	(121)
1、东亚同文会开展对华教育·····	(121)
2、面对收回教育权运动·····	(123)
(二) 在国民革命中维持学校经营·····	(127)
1、中日学院的共同经营：艰苦航程·····	(128)
2、江汉高级中学的独撑：面对武汉政府·····	(136)
3、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生部的兴革：完全挫败·····	(145)
第四章 日本与华南的“籍民”教育·····	(155)
(一) 台湾总督府的“籍民”教育·····	(155)
1、瞩目对岸、籍民登场·····	(155)
2、两面性的籍民教育政策·····	(157)
3、厦门东亚同文书院·····	(158)
4、福州东文学堂·····	(160)
(二) 籍民教育的推进与矛盾·····	(162)
1、对岸教育的概况与展望·····	(162)
2、对岸三校的整备状况·····	(164)

3、南进期的各种矛盾	(166)
4、福州排斥东瀛学校	(170)
(1) 排斥问题的经纬	(170)
(2) 东瀛学校的对策	(172)
(3) 改善东瀛学校的几套方案	(174)
5、收回教育权运动及日本对策	(177)
(三) 籍民教育的改革与终止	(182)
1、展望改革	(182)
2、汕头东瀛学校的经营方针	(183)
3、“九·一八”事变及其影响	(187)
(1) 汕头日本小学校	(188)
(2) 福州日本人的学校	(192)
4、日中战争的推进与籍民学校	(193)
(1) 厦门旭瀛书院	(194)
(2) 汕头东瀛学校	(198)
5、籍民学校的改革与终止	(199)

第五章 日本与二次大战中的欧美在华大学 (203)

(一) 20世纪初欧美在华大学的发展	(203)
(二) 中日战争爆发与欧美系大学	(207)
(三) 太平洋战争中的欧美系大学	(216)

第一章

明治日本与清末中国的教育近代化

(一) 戊戌维新前后：日本谋夺中国教育权

清末中国与明治末日本之间的教育交流曾经出现过一次云蒸霞蔚的繁荣局面。1905年(日本明治38年)，据说中国留日学生达到3000人左右，而日本也有近千人在华就任“教习”之职。

“教习”是那时对新教师的称号。中国雇佣日本教习流行于902年至1908年，1905年是鼎盛时期。

1. 维新前后：日本谋夺教育权

日本对中国积极开展侵略政策是在1862年(文久2年)，那时由奉行开国政策未久的江户幕府向上海派遣了御用船“千岁丸”，这是开始的标志。1872年(明治4年)，日中之间缔结了大日本国大清国修好条规，两国之间正式建立国交。根据条约，1875年(明治8年)，日本三菱汽船会社开辟了横滨至上海的定期航路，拓开了日清交流的实质性道路。

但当时日本与中国贸易往来甚为冷淡，这从日本邮船每周只有一次航行于指定路线这一事实可以反映出来。当时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说：

“我寄希望于朝鲜独立，如其不然，至少也要切断日本之外的各国伸向朝鲜的手。我们如果不与闯入大陆的欧美各国进行角逐，也许连小孤岛的独立也受到威胁。今后，不论在支那，抑或在朝鲜，均应协同一致地对付西方势力之东渐。至少也要把朝鲜作为势力范围加以提携，而使其免于陷入与支那相同之命运。为此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当然，武力一事乃当局之任。”^①

这一番议论是为了对抗欧美资本主义侵入亚洲而主张亚洲乃亚洲人之亚洲的。可是，它的基点是要以日本作为亚洲社会中心来结合亚洲的。就是说，以欧美资本主义为楷模，并急于确立资本主义体制的日本正在力图将欧美先进资本主义从亚洲驱逐出去，代之以日本对亚洲社会的独占支配权。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以这种思想为基础，1874年（明治7年）11月福泽谕吉所主张的“建立商业学校之构想”：

“今日之日本商人既不知于何处购买外国商品，又不知本国商品当销往何处，乃不能不依赖于留在横滨、神户之外国人。而这开港场之外国人既非批发商，又非制造家，实乃道地之掮客也。日本商人纵然不能将这些掮客逐出开港场，亦不应示以盛大之欢迎。其理虽甚明，然今日之景况已被掮客所窘，喧宾夺主之势已成，与伦敦、巴黎之批发商直接对话之途极遥，且以今日之学问难与外国人自由交通，帐目核算之法也难于弄清，故以此视之，不能不说由日本商

^①刊行会刊：《藤山雷太传》第87页。

人发卖之事胜利之望甚少。”^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日本自身的国际贸易问题抱有深刻危机感。据此我们又可以推知他的“亚洲人的亚洲”的设想正是以面对欧美资本主义而产生的日本自身危机感为基础的。换言之，是在确保日本海外市场前提下，确立本国的资本主义。在教育方面这种思考也有敏锐地反映。明治20年前后，重视商业教育的主张出现了。东京商法讲习所、三菱商业学校、新泻商业学校、名古屋商业学校等相继设立起来。此外，1890年（明治23年），9月，日清贸易研究所在中国大陆的一角——上海设立，该研究所是附属于日清贸易商会的。就其名称也可以明白它以对中国商业贸易之研究与商业家之培养为目标。当其开设之时，首任所长荒尾精作了《教育之精神》的演说。他讲道，要以“我邦固有之天真，传播欧洲形而下之所长”，要养成“经纬之才干”、“自立之意志”、“通达精诚团结之志”、“振作磨励精神”等素质。为此，他强调要重视德育、智育两方面的教育。这种想法正是明治以来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变形，并转而形成海外发展的构想。此无他，这是后进国的日本走上独特的帝国主义道路时的构想。这种构想又不单是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教育理想，而且是明治以来日本在进入中国大陆时普遍可见的文化思考。

1895年以后，日本与中国在一场战争之后，双方都主动接近对方，清国有识之士表现出学习日本教育的积极意向；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也极力鼓动加强对中国的教育影响，设立东文学堂如福州东文学堂、杭州日文学堂、泉州彰化学堂、天津东文

^①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20卷，第122页。

学堂、厦门东亚学院、南京同文书院、金陵东文学堂、北京东文学社等。这些行动的动机是什么呢？

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在中国的戊戌维新时期访华，并因发生政变而滞留中国。归国后，他提出“保全中国论”，积极开展对华外交。1899年2月14日，伊藤在海外教育会的一次协议会上以“支那保全论”为基调进行演说。他说：

“……以上所讲海外教育，不仅对于韩国人必要，对中国人亦属必要。盖以我国文明之学术输入之，不惟简便，亦可速成。对此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而文明学问却颇幼稚之国由东洋率先进步之我国施以诱导和帮助，毕竟可为彼此增进幸福。我等应视为我国道义上之义务。不论其朝鲜和中国如何安于现状、不思文明学术之进步，我国皆应从道义上给予力所能及的助力。这不仅有利于保全我国利益，亦实为远东大局所必需。”

伊藤所提倡的积极推进文明化就是指由明治日本向中国和朝鲜“输出”文明。具体说来，就是“使该两国国民自行奋起，急速进行教育变革”。他对于清朝中国的教育工作尤为思虑，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对清朝中国生存攸关的瓜分危机问题，应该当作与日本生存攸关的问题而密切注意。这就是他的“保全中国论”的涵义，即保全中国使之成为有利于日本独立的保障性装置^①。1898年3月6日，对瓜分风潮有决定性影响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缔结完毕。外山正一也随即提出：“日本国民应树立支那存亡与自家安危密切相关的观念”。他进一步说，清国只有普及教育、增进学术，经过一场大革命，始能俨然以东

^①《海外教育协议会上的演说》，《伊藤侯演说集》，日报社文库版，第204—206页。

洋独立帝国之姿态出现”。他预感被欧美列强的瓜分危机所包围的清朝中国如欲谋求教育及学术近代化以恢复其独立，则必会加紧依靠日本人士以开设普通及高等专门学堂。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对康有为一派有意依赖日本以成就复活大业的戊戌新政给予积极评价。外山正一指出，对清朝中国开展教育工作“可使清人深感我之义气而谢恩，民心服我而国交益密，港市贸易愈繁”，总之，“伸彼国权，可收从商之利，冥冥之中，可得树立日本之势力”。这正是那种在与欧美列强的竞争中，期望成为欧美人第二的“支那保全论”^①。外山正一以如上提议于4月30日加入伊藤内阁任文部大臣。8月末，《教育时论》社副社长辻武雄渡海访华，他对戊戌维新派对外不倚列强而赏识并依靠日本，厚待日本人并倾听其说采行其事，认为是日清两国关系之大可贺之事。他在仁川港与挂冠访华的伊藤博文同乘“肥后丸”轮船。他们之间的谈话表现了日本有识之士把中国戊戌新政视为奇货可居而趁机推行日本教育的意图。明治末年日本有识之士希望于中国戊戌新政的是：“清国维新方针概应以我国之风为准则，如教育制度总宜仿行我邦之制度，或派帝国视察员渡日，或派留学生来日，或聘用日本教员”，以达到“日清两国因教育关系而益加亲密”之目标。然而，希望于新政的废八股，奖设京师大学堂及中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教育近代化的举措却突然因9月21日政变而顿挫，只剩京师大学堂一项。明治末年日本人对于西太后为首的清朝政府疑虑重重：“何时能使大中小学教育事业举办就绪呵？”^②戊戌政变，使明治日本对清朝中国丧失了教育磁场的作用。

① 《支那帝国之命运与日本国民之任务》，《太阳》，第4卷第8号，明治31年4月20日发行，13—15页。

② 辻武雄：《北京通信》，《教育时论》第489号，明治31年11月15日发行，第27—28页。

但是，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行在发布的“变法上谕”宣告西太后的“新政”开始了。从而，以“支那保全论”为基础的对清教育磁场作用又得以再现。面对军机大臣、总督、巡抚等大员提出的改革要求，上谕采纳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江楚会奏”三折，决定全部废除督抚学政管下的省府州县的书院，并多设大中小学堂及蒙养院，此谕于9月14日发出。

在此之前，《教育时论》第586号发表《清国教育问题》一文，强调在这一新形势下，“我邦人士在同文同种唇齿辅车关系上，亟应应清国政府及人民之雇佣，或为顾问，或为教师，为光大彼我两国而奋力尽瘁，这与欧美之纯然追逐利益不可同日而语”。他号召说：“我邦学者和教育家们，今后应对清国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备他年之用”。

辻武雄草拟了《清国教育改革案》，表示对“禹域的缙绅先生之补救于万一寄予期望”，这也是对清朝“变法上谕”一连串反应的产物。这份《清国教育 改革案》说：“日清两国之士大夫协同讲求教育乃当今急务”。在这里，人们可以窥见明治末日本把教育工作当作磁场，积极向清朝中国开拓的企图。^①

在《教育时论》第590号（明治34年9月5日发行）上，刊载一篇题为《文部省与清国教育问题》的文章，鼓吹说：“作为清国改革之事业，愈渐就绪，我国人士愈应盛渡彼邦，或被其雇佣为顾问、为教师、为技师，或自行兴办各种事业而经营之”；在此之外，更对明治政府表示：“切望政府率先向清国政府交涉，使该国教育主权为我所收，以便他年重开学务衙

^① 《教育时论》第571号，明治34年2月25日发行，第6、8页。

门，兴起各种学校时我邦学者和教育家得以应聘并抢占重要位置。”^①这一理论与辻武雄的“日清两国之士大夫协同讲求教育”同样表现了明治末年日本收夺清朝中国教育权的用意。

《教育时论》第599号刊载了更露骨的意见：“苟我国教育家能置喙于支那教育问题，甚或最终成为教育上的主动者，成为母国，则不能不掌握其实权。如无此种觉悟，勿宁其始即不见容为妙”。由此视之，作为日本教习而到清朝中国去的日本教育工作者们被日本寄期望于能够发挥收夺教育权的尖兵的作用。^②

与《教育时论》的这些理论相映成趣地是到陕西省三原县宏道高等学堂就任教习的小山田剑南也说：“国权之扩大来自国语之传播，国语之传播又扩大了国权，二者互为因果”，清朝中国聘用日本教习乃扩大国权之“好机运”，不乘此机遇扩大日本语及日本国权，“岂外交或在战争之下哉”？强烈地表示他对这一成果的期待。^③

可是，1902年8月15日制定了《钦定学堂章程》，这是西太后新政之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该章程旨在整顿教育制度体系。在其中，《京师大学堂章程》的第六章第七节上规定：“各教习如有授课不勤及任意紊乱课规等事，无论中外教习，亦无论年满与否，管学大臣皆有权辞退之。延聘外国教习时即应将此条注明于合同之上”。这样，京师大学堂中的外国

① 《教育时论》第590号，第42页。

② 五十岚生：《关于支那教育调查会之设立》，《教育时论》第599号，明治34年12月5日发行，第23页。对此论说，《清议报》第一百册以“异哉所谓支那教育权者”为题予以明确批评。

③ 《日本语在支那的传播》，《日本及日本人》第171号，明治35年9月20日发行，第14—15页。